

学术史研究 主持人 陈众议

# 海明威研究在日本

郭颖 吴光辉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清晨，一颗文学的巨星在美利坚的上空陨落了。这颗文学巨星的光芒不仅照耀过美国、加拿大、法兰西、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也曾闪耀于遥远的非洲与神秘的亚洲。他就是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一九九九年，美国斯克莱纳出版社出版了帕特里克·海明威编辑的海明威生前未出版的著作集《曙光示真》，以此来纪念海明威诞辰一百周年。但是，海明威的诞辰纪念并非局限于美国，同时也出现在了欧洲、亚洲的海明威研究界的活动之中。以日本为证，海明威协会在成立之初即推出纪念文集《跨越海明威——文本的变化》。正如该文集的标题所示，海明威可谓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一座高耸的山峰，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将如何跨越他这座高峰呢？

## 一、日本海明威研究概述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巨奖，一直牵动着东西方文人的心脉。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授奖理由之一，即在于“在现代小说艺术领域发挥了无与伦

比的力量，在文体革新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美国故事讲述者”专栏，以海明威作为封面人物。由此，也就传递出了海明威作为文学巨匠，或者是战后美国的代表人物的强烈信息。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就被美国打败转而崇尚美国文化、经历着第二次开国的战后日本而言，海明威无疑是一个具有了无限魅力的美国的代表形象。

日本海明威研究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展开的。一九五四年，志贺胜编撰出版了《海明威研究》（英宝社），可谓是开启了海明威研究的先河。在这之后，高村胜治出版了《海明威》（新英美文学丛书，研究社出版，一九五五），谷口陆男出版了《海明威的肖像》（南云堂，一九五六）、《海明威研究》（三笠书房，一九五六）。不仅如此，以东山正芳的《虚无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交错》（《英美文学》，关西学院大学，一九五四）、池田昌夫的《海明威的文体》（《武库川学院女子大学纪要》，一九五五）为代表，日本研究者撰写

转引自西尾岩《海明威小说的结构》，第10页，东京：研究社出版株式会社，1992。

的一系列研究论文开始涉及到了海明威的文体、主题、意向乃至人物风格的问题。与这样的一系列研究同步,海明威的文学翻译也开始起步,《海明威全集》得以在日本翻译出版。不仅如此,伴随着文学翻译的进行,海明威的个人传记、人物评价、文学方法也随之被介绍到了日本。正如一大批海明威研究的著作被收录到了英美文学作家论丛书、二十世纪英美文学介绍、新英美文学丛书等一系列标题所示,海明威是作为二十世纪英美文学的代表人物而被日本的研究者确立了其不朽的文学地位。

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海明威研究侧重在了文本的解读、意向的描述、人物的介绍的话,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海明威的研究更为注重研究的主题与方法。伊东高丽夫《海明威——艺术与病理》(金刚出版社,一九七二)、佐伯彰一《撰写、恋爱、生存——海明威传》(研究社选书,一九七九)、加藤宗幸《海明威笔记——虚无的超克》(九州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等一系列研究书籍,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的海明威研究的主题与方法。进而言之,审视这一批研究著作的书名,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的创作风格究竟如何;海明威人生之中的女性与男性,或者说性别(gender)的问题应该如何来加以理解,作为“硬汉式”的海明威形象与“自杀”的海明威形象之中究竟体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意识,无疑成为了这一时期海明威研究的焦点问题。

不仅如此,海明威被称为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正如研究者加藤宗幸《海明威笔记——虚无的超克》一书的标题所示,如何超越战后的“虚无主义”,探索超越这一“虚无主义”的内在契机,也成为日本研究界的关注焦点之一。之所以如此,或许我们可以联想到日本文学代表人物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的“自杀”事件;可以联想到京都学派哲学家西谷启治所提出的“惟有穿过虚无主义,才会超克虚无主义”的警句。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海明威研究也与战后日本自身的社会病理、文化基准的自我认识密不可分,日本的研究者或许是试图通过海明威研究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契机吧。

海明威研究走向高潮,应该说是在海明威

诞辰百年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之初。在这一时期,《海明威“爱”、“生”、“死”——由此而追求到的至上的精神》(东京近代文艺社,一九九九)、岛村法夫《海明威——人与文学》(勉诚出版,二〇〇五)、今村楯夫《海明威的语言》(新潮新书,二〇〇五)等一系列研究书籍得以出版。审视这一系列著作的标题,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之前的主题性研究得以延续,并被上升为了一种“生命主义”的精神性的范畴;一方面,应该说是日本战后文学研究的基调,即“人与文学”的研究框架得以延续下来,也涉及到了海明威的新的解读与新的评价。不言而喻,这样的新的解读与评价,是基于海明威的未曾发表的小说群为对象而展开的。不过,正如“海明威的语言”这一标题所体现出来的,“文体”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如果说日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海明威之“文体研究”是基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理由而进行的尝试,那么如今所展开的“语言研究”则是以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语境为背景,且涉及到了全球性的文明对话、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文学的本位、主体性哲学的演绎与文学者的身份等一系列现代性的问题。

之所以强调,到了二十一世纪才步入一个高潮,也是基于《海明威研究》这一日本海明威协会杂志的研究成果。自二〇〇〇年出版创刊号以来,海明威协会的机关刊物《海明威研究》一直发行至今,而且还始终坚持召开年度会议,并积极邀请国内外学者参与。其编撰的研究杂志也采取特辑与学术论文的编辑方式,先后刊载了“海明威与非洲”、“海明威与大众文化”、“海明威与美国”、“海明威与性别”、“海明威与同时代的作家”等一系列特辑研究,并刊载发表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电影演员,是日本战后文学的大师之一,被称为“日本的海明威”,曾两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为极端激进政治目的而自杀。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在工作室以自杀形式离开人世。

西谷启治是日本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代表著作《宗教是什么》曾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见堀尾孟《穿过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超克——西谷启治》,藤田正胜编:《为了学习日本思想的人》,第301页,东京:世界思想社,1997。

了为数不少的新锐研究者的学术论文,成为日本的海明威研究的学术重镇。这一研究样态,一方面昭示出日本的海明威研究的多样性;一方面,也标志着日本的海明威研究的世界性,即构建起了具有一定的世界性格、且带有日本自身风土特征的海明威研究的基调。

概而言之,日本的海明威研究经历了一开始的人物介绍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承袭,而后深入到文本分析的主题研究与思想研究,到了二十一世纪,日本海明威研究的多样性与世界性的色彩则是日益显著。至少我们可以提出的确证之一,即日本的海明威研究如今成为了美国、同时也是中国极为关注的对象之一。

## 二、日本的海明威研究专题

承前所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文情节无疑是海明威文学的最大魅力之体现。但是,若是我们审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海明威研究的历史轨迹,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还原到其文学本身,由此来质疑海明威的魅力究竟何在,即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日本研究者的关注呢?而且,为什么在海明威逝世之后的五十年期间,这一关注始终没有消减,且呈现出了带有日本特色的研究色彩呢?作为日本的海明威研究,接下来我们将逐步展开,按照日本研究者的研究专题来加以探讨、深入下去。

### 1. 海明威的形象——“硬汉”与“隐喻”

海明威留给世人的最为突出的形象,即其永不磨灭的“硬汉”形象。所谓“硬汉”,最早乃是来自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之中的、针对杰克所强调的“白天针对所有的事物采取硬汉式的处理方式极为简单,但是到了晚上则与之不同”这么一段话。如今则是广泛地应用到了“无感情的”、“即物性的描写”的文体或者风格。日本研究学者西尾岩指出,这一文体或者风格的特征体现为:大量使用日常性的、维持在了“基础性英语”这一基准的词语;采取回避从句结构、罗列单句的行文模式;极力避免使用形容词或者之后附载的副词的修辞方式。海明威尤为注重名词的运用,避免使用抽象的语言,大多采用即物性的语言表述。不仅如此,他还提到海明威之

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海明威与外部事物之间始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始终坚持了一个客观描述的立场。

对于海明威的这一“硬汉”形象,日本学者较之于历史社会性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物的内心解读,以反映人的内在的精神结构。岩塚纱织《〈太阳照常升起〉之中杰克·巴恩斯的精神复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交换的脱离》(二〇〇四)、仓林秀男《何谓海明威的硬汉形象》(二〇〇七),尤其是后者,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不过,就此而言,堀内香织的《旗鱼与狮子——冷战期间海明威的人物像》(二〇〇九)一文,则是站在东方女性的独特视角来对美国式的“硬汉”形象进行了解读。

堀内香织的海明威认识,有了一定的颠覆性的风格。针对海明威的形象,堀内首先指出,现今海明威的人物形象研究从以往的“硬汉”形象,转到了其内在的纯情与懦弱的一面,甚至是带有同性恋倾向的一面。这样的评论之下所显现出来的,乃是与“国民作家”的问题一样潜藏在冰山之下的复杂主体。之所以提到“冰山”,是基于海明威《死在午后》(一九三二)之中的自我表述:“冰山所持有的威严,不过是来自于水面所显现出来的八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说,真正的意图或者复杂的主体,需要我们深入到文本的背后来加以挖掘、编排与重新认识。

《老人与海》是日本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海明威作品之一,堀内香织的研究论文之标题就借鉴了这部小说之中的“旗鱼与狮子”的形象。众所周知,海明威大多爱描写美国之外的流浪汉或是为世俗所排斥的人物,但是《老人与海》的主人公桑地亚哥的原型是一位现实生活之中的实存人物,其人生的背景为西班牙与古巴,这超越了之前自身文学所创造的一系列形象。对于这一作品,堀内将目光投向了旗鱼与狮子的隐喻,把冷战时期美国大众追求的国民作家形象与通过作品而解读出来的作家形象进行了比较,指出正如桑地亚哥与旗鱼的斗争之中其自身所强调的“我就是你”这一表述所体现的,旗

西尾岩:《海明威小说的结构》,第11页,东京:研究社出版株式会社,1992。

鱼代表了作为“白人”的渔夫,乃至与鱼竿、大海融聚在一起的,作为“狩猎者”的海明威的自我形象。与此同时,海明威曾经创作了大量以黑色的非洲为舞台的作品,狮子是作为“狩猎者”的形象出现在了主人公桑地亚哥的梦中。换句话说,“狩猎者”的形象尽管在此融为了一体,但是却出现了代表白人的“旗鱼”与代表黑人的“狮子”的双重形象。堀内香织指出,《老人与海》潜藏了这样一种“主体性”意义的争夺,也反映出了海明威自身的“暧昧性”的精神世界。

众所周知,《老人与海》经过了美国大众传媒杂志*Life*的登载之后,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海明威之前的作品评价并不是那么高,然而自此之后却一跃成为了“国民作家”。这一事实说明了这部作品乃是将海明威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交触点。但是,海明威自身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评价呢?或许堀内香织的研究目的并不是期望对此予以解答,而是通过《老人与海》的隐喻性表象的研究来阐述海明威内在的“暧昧”性格。不过,若是我们联想到“暧昧”恰恰就是日本国民固有性格——大江健三郎的诺贝尔奖讲演标题《暧昧的日本的自我》——的话,我们也不得不感受到这或许是堀内香织基于日本人自身的感性而进行的一个评价吧。

## 2. 海明威的文学主题——方法与结构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与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并称为美国海洋小说的代表,它深刻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性的回复。众所周知,大海在《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之中就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同时也作为了出场人物发挥自身精神的舞台,或者与之对立,或者与之和谐,由此也就体现出了最为质朴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联。对此,日本研究者渡久山幸功就《老人与海》究竟是一部单纯描写大自然的作品,还是寓环保概念于内,以一种超越人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小说而提出了质疑,并将自身的研究标题确立为了《〈老人与海〉可否称之为环境文学?》(二〇〇八)。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桑地亚哥热爱辽阔的大海与海洋的生物,并把动物与人类放在了一个平等的地位。这一人物形象超越了人类中心模

式,继承了美国自然写作先驱梭罗的概念。但是与此同时,桑地亚哥也并非将大海视为一个野性的对象,并大力提倡要保护大自然,而只是把它作为捕鱼的场所——同时也是将自己包容在内的场所。对此,渡久山幸功针对《老人与海》所潜藏的自然与环境的主题而提出了自身的思考,并站在了如今大力提倡的环境文学或者生态文学的框架之下。那么,《老人与海》的自然描写,究竟是单纯地源自海明威自身酷爱钓鱼的兴趣?还是海明威刻意地选择以大海为对象的环境生态学的视角,具有了一种提倡保护野性的先见呢?海明威留给我们的遗产或者思考,或许也就在于它给现代的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联想与思索的契机吧。

针对海明威文学的技巧或者方法,西尾岩指出,海明威巧妙地利用了西欧古典悲剧的结构,赋予小说以一种完整性的结构的效果。众所周知,欧洲古典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一般采取了“介绍”(Introduction)、“发展”(Complication)、“高潮”(Climax)、“解明”(Resolution)、“终结”(Conclusion)的结构来铺叙剧情,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可以说就是以这样的古典悲剧为基准构建起了故事情节。不仅如此,《印第安人营地》、《弗兰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构成。而且,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也几乎全部是沿袭了这样一个叙事结构。

海明威对自身小说的叙事结构抱有一种执著的追求,这一情节也深刻地反映到了小说的细节描写之中。这一体现的最大特征,即在于海明威的小说之中不厌其烦地、频繁地使用三与五,也就是说,其小说大多是采取了三或者五个部分的结构构成。以《老人与海》为例证,海明威有意地使用了五。首先,其叙事方式可以分为介

堀内香织:《旗鱼与狮子——冷战期间海明威的人物像》,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9,见日本海明威协会网页(<http://www.soc.nii.ac.jp/hsj2/society.html>)。

渡久山幸功:《〈老人与海〉可否称之为环境文学?》,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8。

西尾岩:《海明威小说的结构》,第18页,东京:研究社出版株式会社,1992。

绍、发展、高潮、解明、终结五个阶段,乃是沿袭了之前所强调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方式。其次,在这部作品之中,老人与鲨鱼之间的搏斗经历了五回,少年第一次参与外出渔猎恰是五岁,老人从港口走向小屋的途中休息了五次。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将这部作品的辅助性的主题理解为基督受难的悲剧的话,那么海明威所突出的“五”也就暗合了基督教所强调的“欲求、信仰、希望、谦逊、爱”的基本要素,这一系列要素无疑进一步深化了这部作品的主题。

### 3. 海明威的奋斗——宗教与政治

承前所述《老人与海》涉及到了基督教的宗教内涵。日本学者也关注到了海明威的“宗教”内涵。对之加以解读的代表性研究,在此我们可以提到高野泰志《革命家的祈祷——海明威作品之中的宗教与政治》(二〇〇九)一文。

该文提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一直苦恼于宗教与政治之间的问题。与第二任妻子保利娜结婚之后,海明威就开始改信天主教。至今为止,世人皆认为海明威的宗教改信不过是名义上的变更,并没有对它加以重视。不过,通过人物传记所保留下来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海明威对于自己的信仰实际上抱有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在得知西班牙天主教与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同流合污之后,海明威依照自己的人生信条,毅然加入了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人民战线,决定支持对抗教会与法西斯的共和国一方。人民战线以“废除上帝”为口号,采取了敌视教会的态度。因此,海明威在支持共和国的同时,也就不得不陷入到与教会相敌对的困境之中。

高野泰志提到,海明威最初的短篇作品《革命者》就体现了海明威心境的变化。在这部小说之中,年轻的马扎尔自匈牙利逃亡到了意大利,尽管成为了故国匈牙利白色恐怖的牺牲品,但是马扎尔革命式的恐怖活动却被称为了“基督教大义”。小说之中提到,革命者大量购买宗教画复制品,并以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来进行包装。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隐喻意义,即通过社会党的报纸与宗教画的组合,来表达年轻革命党人祈求政治和宗教和平融合的愿望。但是,小说的结尾则暗示其根本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并在瑞士小城西昂被捕入狱。由此可

见《革命者》的写作者是与革命者保持了一定距离的观望者。高野泰志认为,这也正是海明威的个人态度之写照。

到了《丧钟为谁而鸣》(一九四〇)之际,应该说海明威的政治信条与宗教信仰已经发生了破裂,他更愿意将这样的冲突与矛盾理解为一个“个人化”的问题来加以处理。既然海明威思考的前提在于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破裂,那么小说的出场人物也就自然地反映为了一边试图抛开宗教却又无法割舍,一边内心处于矛盾与混乱的人物心理。不可否认,海明威的政治与宗教并没有保持一个首尾贯通的连续性,或许正是共产主义与被共产主义者视为“人民的鸦片”的基督教势不相容,因此海明威的宗教与政治的认识才会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性格。高野泰志指出,正是挣扎于这样的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心境,才构成了海明威文学创作的源泉。

### 4. 海明威的“困境”——生存与死亡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海明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他却并没有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回顾整个二三十年代,“死亡”可以说是海明威的创作主题之一。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发表《太阳照常升起》,描写了二战之后的死亡之幻影。一九二九年,海明威出版《永别了,武器》,也描述了自身的死亡式的存在感。海明威之所以处在了一个长时期的没有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之中,若松正晃通过发表《斗牛与斗牛士——作为死亡研究书的〈死在午后〉》(二〇〇九)一文,认为这不过是暂停创作脚步的海明威为了剖析自己之所以对死亡抱有恐怖的本质根源之所在而已。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死在午后》(一九三二)这部小说乃是解读这一时期海明威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认为《死在午后》这一作品采取了随笔性的文体来阐述西班牙斗牛士,因为一直以来皆被人们作为“斗牛”这一充

西尾岩:《海明威小说的结构》,第21-22页,东京:研究社出版株式会社,1992。

高野泰志:《革命家的祈祷——海明威作品之中的宗教与政治》,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9。

满了西班牙文化风情活动的解说来加以认识。但是,海明威究竟为什么会斗牛倾注了如此的热情呢?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人来加以论述。若松正晃认为,要解读这一问题,最为关键的即在于这部小说的起始部分。“The only place where you could see life and death i.e. violent death now that the wars were over was in the bull ring and I wanted very much to go to Spain where I could study it”。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对于海明威而言,并非是单纯的“斗牛”研究书,而是一部死亡的研究书。换句话说,在此所阐述的“斗牛”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反映了海明威的文学观乃至人生观。

若松正晃还指出,这部采取随笔性的文体所撰写的非虚构小说就是通过斗牛场上反复演绎的生与死的瞬间,来探讨“死亡”的本质与斗牛士的“生”的本质。而且,透过《死在午后》之中的斗牛士的身影,我们也可以发现海明威不断试图克服死亡之恐怖的内在心理。不仅如此,若松正晃进一步联想到了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永劫回归”与“超人学说”,通过海明威与尼采之间的关联性来捕捉与把握海明威的生死思想。这样一来,或许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新的解释性的立场来重新探讨海明威的生命思想,并由此来探讨《死在午后》这部小说在海明威文学之中的新的定位。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即“死亡”的文学主题应该说也是日本文学自身的主题之一。如何面对死亡,究竟是采取破灭的方式还是采取调和的方式,正是日本“私小说”的两个基本意向之选择。若松正晃在此选择了以“死亡”为主题的研究视角,或许也与日本自身的文学观念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吧。而且,尼采的学说也曾被日本的文学研究者加以沿用,以之来解释日本文学自身的“死亡”主题。海明威的“死亡”主题究竟如何?或许将来也会在一个比较文学的视角下得以展开吧。

##### 5. 海明威与性别——男女之“间”的紧张

海明威与性别这一研究,可以说也是日本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出前田一平《两性具有论的出处与走向》(二〇〇四)、小笠原亚衣《眼神的欲望》(二〇〇

四)、谷本千雅子《艾略特夫妇的性》(二〇〇四)、新田启子《太阳照常升起?性差混乱的有无》(二〇〇四)、高野泰志《布莱特·阿什利的界限侵犯——从下半身来解读〈太阳照常升起〉》(二〇〇六)、辻裕美的《〈伊甸园〉中的性》(二〇〇七)等一系列研究。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女性研究者尤为关注到了这一研究主题。

海明威小说之中的男主角,经常遭受身体的伤害,且带有了一定的“权力的刻印”。这不仅成为了一种男性机能的证明,同时也令主人公满身创痕的身体被置于一种“为人审视”的地位。也就是说,男性的特征在于满身创痕,这样的遍体鳞伤的身体或者残缺的身体放在了历史上,则被认为是处在了“女性化”的立场之下。就此而言,黛博拉·莫德尔莫格可谓正是看破了这一点的人。

绪方桂子通过莫德尔莫格的解释与阐述从而得到了启示,在《身体的伤痕与缺陷》(二〇〇五)这篇研究论文之中,她指出海明威笔下的“伤痕”令男性的身体成为了一种可视化的装置,针对《太阳照常升起》的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她专门谈到了巴恩斯丧失生殖器的象征意义。如果说伤痕是身体的烙印的话,那么,生殖器的丧失绝不只是一个器官的丧失,而是标志着性别的转换,或者说自身主体性的丧失吧。与之一样,长尾晋宏的《〈先生,祝你们快乐〉之中的性》(二〇〇七)一文则是以自己切断生殖器的少年为对象,指出尽管生殖器作为“性”的象征发挥着男性的机能,但是小说的情节设定却使少年失去了男性的象征。

《伊甸园》出版之后,海明威小说之中的两性题材逐渐多样化,也吸引了日本研究者的广

若松正晃:《斗牛与斗牛士——作为死亡研究书的〈死在午后〉》,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9。

平野谦:《文学与现实生活》,第145页,东京:讲谈社,1958。

海明威笔下的男性形象研究,见南英耕《海明威巡礼》,第271-278页,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3。

绪方桂子:《身体的伤痕与缺陷》,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5。

长尾晋宏:《〈先生,祝你们快乐〉之中的性》,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7。

泛关注。辻裕美在《〈印第安人营地〉之中的孕妇身体与男性性征丧失》(二〇〇八)的研究论文之中指出,《印第安人营地》(Indian Camp)是海明威作品之中最具有冲击性、最为暴力的短篇小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印第安部落的生与死并不纯粹是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暗示着印第安部落与自然一道消失的悲剧。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者关注到了印第安父亲的自杀问题,但是对于给予读者以强烈印象的印第安孕妇的身体,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剖析与研究。对此,辻裕美通过《印第安人营地》这部作品的诠释,指出男性性征的丧失与女性身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印第安人营地》这部作品只不过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被阉割的印第安男子的故事。但是,四肢被按住,没有进行麻醉,被迫接受剖腹产的印第安女人的悲鸣却没有引起白人医生亚当斯的关注。巴恩斯医生以水手刀来割开孕妇的腹部,以钓鱼线来缝合孕妇的身体。自杀的印第安男人与垂死挣扎的印第安女人,代表了濒临灭亡的自然与森林。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在一个“西洋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的对立视角的话,那么,印第安女人的身体可以说象征着印第安男人的“所有物”或“领域”,亚当斯医生几乎是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压抑印第安女人的身体,也就意味着压抑印第安男人的男性性征与基本权利。也就是说,通过榨取印第安女人的身体,产生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对立的权力结构。在此,辻裕美通过分析作为“物体”的孕妇的身体表象,发现了西方文明秩序下的“空洞”与“断裂”。

海明威曾被称为“不善于描写女性的作家”。确实,其小说之中的女性或是美丽、勇于献身、温顺善良的女性,或者是任性、薄情、受到男性支配的恶女。不过,日本研究者村冈真理子的《女性孕育的海明威》(二〇〇八)一文则是独辟蹊径,以《老人与海》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海明威是如何将大海与小船作为女性形象来加以描写的。她指出,主人公桑地亚哥眼中的大海,时而优雅、美丽,时而残酷、邪恶,具有了各种各样的生动表情,也具有了最为丰富的女性性征。总之,海明威心中的女性不仅性格复杂,而且具有

丰富的洞察力。海明威将女性分为善女与恶女,赋予了接近于绝对化的特征,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对女性怀有深深的爱意,女性可以说正是海明威的生活与思考的源泉之一。

#### 6. 海明威与现代社会——美国·东方·非洲的文化领域

海明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身处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之中,因此,其小说创作充满了时代的色彩,同时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病理。就此而言,海明威与现代社会的研究,也是日本研究者一贯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藤理彩子《海明威与大众文化》(二〇〇二)、千叶义也《不景气时期的美国》(二〇〇二)、村上东《海明威与异文化理解的系谱》(二〇〇四),可以说是站在各个不同的立场论述了海明威与美国大众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关联。

但是,日本研究者并没有局限于美国文化这一对象本身。正如海明威被视为了世界性的作家这一基本认识所昭示的,日本学者也关注到了海明威的世界性。本庄忠大《站在人种的视点来审视二十年代的巴黎与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人种意识》(二〇〇四)、中垣恒太郎《海明威的意大利之旅》(二〇〇六)、早川阳子《解读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文学作品——消失的讲话者、留下的听话者》(二〇〇四)、长谷川裕一《名为〈西班牙〉的一部故事——以Ken为中心》(二〇〇六)、塚田幸光《海明威的“告密”——探讨〈西班牙大地〉之中的政治》(二〇〇六)、村上东《两个大型物语之间——冷战时期的海明威》(二〇〇六)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将海明威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论述海明威与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影响与联系。

#### 海明威与东方、海明威与日本这样的研究

辻裕美:《〈印第安人营地〉之中的孕妇身体与男性性征丧失》,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8。

村冈真理子:《女性孕育的海明威》,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8。

海明威与美国之间的关联性,可见柴山哲也《海明威为什么死亡?》,第177-180页,东京:朝日出版社,1994。

视角,也得到了日本研究界的关注与重视。自中国学者杨仁敬考察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出版了《海明威在中国》的研究著作之后,日本也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旅日中国学者陆君发表了《海明威与中国之旅》(二〇〇六)、黄峻《海明威与中国的交错》(二〇〇六)、日本学者柳泽秀郎也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机密文件之中的海明威的痕迹》(二〇〇七)的研究论文。不过,作为日本研究者,他们最为关注的还是比较研究的视角。片冈洋子的《海明威与宫泽贤治》(二〇〇二)一文,站在生态学的角度,审视了海明威与日本国民作家宫泽贤治之间的关系。柳泽秀郎的《海明威与日本》(二〇〇六)一文,则是通过海明威的藏书研究,来考察海明威与日本文化之间的接触,并以海明威的自杀为对象,把它与日本文化进行了比较。一九七二年,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如此,他最终也是以自杀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鹤田欣也由此就展开了海明威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

不仅如此,海明威与非洲,或者海明威与黑人的问题也得到了日本研究界的极大关注。中村嘉雄《海明威的非洲时空——超越了Green Hills of Africa》(二〇〇六)、谷本千雅子《“非洲”究竟位于何处?——〈伊甸园〉的非洲物语与“部落事情”》(二〇〇七)、本庄忠大《非洲原住民族表象之下的海明威》(二〇〇七)、比嘉美代子《解读〈在乞力曼扎罗山下〉——作家的苦恼与变身、再生愿望的主题、作家再生的试验地非洲》(二〇〇七)等一系列研究,不仅仅站在文学的立场,同时也站在了异文化对话的立场来对海明威的非洲印象进行了诠释。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村亨在《〈太阳照常升起〉之中消失的黑人的声音》(二〇〇九)之中写道,自托尼·莫里森发起批判开始,海明威文学中的黑人象征意义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太阳照常升起》之中,尽管不过是充当边缘角色而已,但是“黑人”的登场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通过文本的对照,中村发现《太阳照常升起》初稿之中的黑人的记述较之正本篇幅更多,而且还出现了黑人之间的辩论。但是,到了出版之际,海明威却将黑人部分进行了大篇幅的删除,且几乎消减了黑人说话的机会。海明

威如此改动的动机究竟何在?这样进行删除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在此,海明威执笔期间所阅读的安德森的小说《暗笑》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文明观念下的白人与黑人、文学传统之间的传承与影响,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海明威的文学研究领域下的现代社会研究。

### 三、海明威的日本评价

海明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日本的英美文学研究者们专门组织成立了“海明威诞生一百年日本委员会”。为什么在海明威逝世了接近四十年之后,日本会借助这一百年诞辰的契机来组织海明威协会呢?事实上,海明威与日本之间可谓是毫无交叉之点。海明威与东方之间的纽带,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海明威曾经被派遣到了中国,这可以说是海明威与日本最为接近的一场接触吧。不言而喻,海明威对于日本并不抱有什么好感,或者说是站在敌对的立场来看待它。但是,日本人对于打败他们的美国人——海明威却没有产生丝毫的厌恶之情。恰恰相反,不管是海明威的人物形象还是他的文学作品,却以一种难以名状的特殊魅力吸引着日本人,即便是时至今日,日本的海明威研究依然是蓬勃兴盛。

那么,海明威在日本人的心目之中究竟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首先,海明威的小说之所以得到日本民众的青睐,其最根本的理由之一,正如日本的海明威研究者、翻译者大桥健三郎所指出的,“海明威的生涯与作品最为深刻地反映了二十世纪的本来面目”。确实,海明威经历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事件,并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成为了这一系列历史大事件的体验者与传递者。而且,他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地进行创作,而是与为数众多的诗人、作家、批评家一道构成了美国的“垮掉的一

三木信义:《海明威与原始主义》,第81-100页,东京:开文社,1994。

中村亨:《〈太阳照常升起〉之中消失的黑人的声音》,日本海明威协会全国会议学术发表报告,2009。

大桥健三郎:《海明威》,第496页,《世界的文学》,东京:中央公论社,1993。



代”共同地以自身创作的笔墨来勾勒出二十世纪整个世界与人类的思想变迁或者精神历程。正因为如此,日本出版的英美文学作家论丛书、二十世纪英美文学介绍、新英美文学丛书等一系列文学丛书之中,海明威成为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收录对象。

其次,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海明威的个人魅力。作为个人,海明威一生狂放不羁,作为艺术家,海明威严于律己,几乎接近于神经质。但是,正如研究者西尾岩所指出的,对于这样的充满了矛盾的海明威形象,我们绝不可以混淆在一起,由此来论证海明威的复杂人格。海明威曾经在《太阳照常升起》之中提到:“不仅战争是悲剧,生存本身就是悲剧,人逃过了战争,但却逃不过命运。”这一段话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共鸣,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将它理解为人类要屈服命运。既然命运无法改变,那么我们只有改变我们自身,也就是要进行自我的革命——日本称之为“人间革命”。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海明威的文学创作来源于深刻的生活体验。海明威并不是一个轻率随意的创作者,而是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正式执笔的严肃作家。不仅如此,海明威还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小说家,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演之中提到:“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每一部著作都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即便是到了人生的最后,失去健康的海明威选择了自杀的道路,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其生命价值或创作激情的一种延续吧。

第三,海明威文学自身的思想性,应该说也是吸引日本人关注的重要线索之一。之前我们所提到的“硬汉形象”、宗教与政治的问题、数字文化背后的小说结构的问题、死亡的文学主题、文化观念下的多领域对话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现代日本所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或者说,日本海明威研究的各个专题契合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现代日本的发展轨迹,其文学探讨本身就是谋求解决日本自身问题的一个媒介。进而言之,日本学者的研究可谓是最大化地挖掘海明威文学的现代价值,谋求其针对现代社会病理的解决途径,而不仅仅只是文学的创作手法或者思想理念的问题。不言

而喻,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日本的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切身体验、促进反思的历史大事件的缩影,但是对于海明威而言,无疑是一个未来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刻意地强调海明威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走到了时代的前列,而应该是现代的我们通过审视海明威的文学创作,确实发现了其文学所具有的未来性或者说时代的前瞻性。

第四,我认为也不可忽视的一点,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日本独特之处,即日本的研究者们不仅努力地进行海明威的文学研究,同时也大量地进行了海明威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即便是海明威未曾发表的文学作品,以新潮社、中央公论社为代表的日本大型出版社也会在欧美刊行不久就立刻组织人员进行翻译。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一作品的翻译,日本也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版本。如此操作的结果,无疑为海明威的最新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文献资料。事实上,日本的海明威文学的翻译大多同时附加了研究者的解说、海明威的年谱,基于之前的研究资料不断地加以充实,从而保障了研究资料的更新与拓展,也为日本的海明威文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九九〇年,在宣告冷战结束的马尔他会议记者招待会召开之际,戈尔巴乔夫曾引用了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的文字来强调结束冷战乃是人类的正义。这一段历史的插曲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遐想:海明威作为一名文学家竟然如此地影响到了现代政治。确实,海明威的自杀曾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应该说也是针对二十世纪的“原罪”的最大挑战。海明威或许预见到了古巴危机、或许看到了东西之间的冷战对立,这样的历史事件无法改变。但是,海明威的“笔”并不是无力的,而是通过它留下了饱含力量的文字,并间接地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

文学的力量尽在于此。日本人研究海明威的激情,或许也正体现于此。无论是《永别了,武器》,还是《丧钟为谁而鸣》, (下转第158页)

西尾岩:《海明威小说的结构》,第1-26页,东京:研究社出版株式会社,1992。

货的行动,但替代品也只能是美国等其他国家的轮船,因为在太平洋航线上还没有中国航空公司的轮船。一九一五年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恰逢美洲太平洋邮船公司因美国法律禁止其雇佣华人水手而停航,太平洋航线将几乎被几家日本航运公司独占。这几家日本航运公司为报复中国人的抵制日货运动,向中国客商抬高运价。有鉴于此,旧金山华商联合中华会馆、旧金山广东银行等筹措经费,购买了美洲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中国号”轮船,于一九一五年十月成立中国邮船公司。公司成立初期,运营良好,获利颇丰,于是又购买了两艘邮船投入太平洋航线。但后来该公司经营不善,一九二二年底倒闭。

### 三、结语

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五年在中国国内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都得到了美国华人的响应。从外在结果上看,两次抵制日货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商业利益,但没有也不可能成功阻止廉价的日本商品在中国的销路。

在美华人数量有限,经济实力薄弱,更不可能对日本的对美贸易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作用不在此。两次运动中,以《中西日报》为代表的华文报纸发挥了舆论导向的作用,在美华人展现了不惜牺牲自身经济利益的爱国精神和提倡国货的爱国方式。在美华人深受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之苦,仰人鼻息,他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强大的祖国为后盾就难以在异国生存。这种个人际遇与家国情怀的结合是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

【作者简介】梁兴莉,上海金融学院外语系讲师。

---

黄华:《记中国邮船公司》,《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3号,第40-45页。张心澂:《中国现代交通史》,第289-290页,上海:上海书店,1931。

黄炎培:《可惊哉日本在华之贸易》,《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6号,第18-20页。

“Chinese Plan Huge Boycott Against Japan”, *Albuquerque Journal*, 03-02-1915, p.4.

---

(上接第149页)

海明威彻底的“非战论”激发起了日本人的共鸣。不仅如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中所突出的生态主题《乞力马扎罗的雪》之中所强调的异域体验与文化对话的情节,也最为深刻地影响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为重要的,可以说是海明威的那段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总

之,文学的海明威、硬汉的海明威、政治的海明威,由此所构成的一个海明威的多元形象,将会进一步引导着日本研究者不断地去挖掘、深入海明威的研究。

【作者简介】郭颖、吴光辉,厦门大学外文学院。